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三赴“特园”

沈志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民盟主席张澜与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遹、鲜英等前往机场迎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三次赴“特园”拜访民盟主席张澜。

第一次是8月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特园”，晤谈地点早由周恩来安排在张澜的卧室促膝恳谈。毛泽东首先转达了朱德总司令对老师张澜（朱德曾是张澜的学生）的问候，转达了吴玉章对好友的问候。张澜说：“蒋介石在摆鸿门宴，他哪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几年前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了，这是他演的假戏啊！”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假戏，我们就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分清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

接着，毛泽东向张澜详细解释了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六项紧急措施。张澜听后连声称赞：“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施行”。

当晚毛泽东在曾家岩“桂园”张治中寓所宴请张澜、黄炎培、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等，进行长时间的广泛交谈。

第二次是9月2日，张澜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鲜英、冷遹等作陪。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毛泽东支持民盟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斗争，支持民盟提出的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

等主张。宾主就时局问题进行了亲切交谈，席间“特园”主人鲜英献上家酿枣子酒。张澜举杯向毛泽东敬酒说：“会须一饮三百杯”（李白《将进酒》中诗句），毛泽东引陶潜的《饮酒》诗中句子答道：“且共欢此饮。”毛泽东并勉励大家道：“今天我们聚会于‘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创建民主之国，生活在民主之国。”宴毕，鲜英的大女儿鲜继桢捧出纪念册，请毛泽东题字留念。毛泽东当即题了“光明在望”四个大字相赠。

9月11日晚，毛泽东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介绍了两党和谈情况，征询大家的意见。张澜等表示愿在和谈中尽力斡旋。席间周恩来报告了国民党部队向上党地区中共军队进攻的消息，在座者皆为愤愤不平。张澜愤慨地说：“公开打电报请你们来谈判，又背地里发动战争，绝对不容许国民党干预！”接着张澜于9月14日上午，约请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张群、邵力子到民盟所在地“特园”相会，张澜直截了当地质问张群、邵力子：“重庆在谈山西在打岂不貽笑于天下吗？阎锡山怎么不给蒋先生（蒋介石）留点面子。”张、邵很窘，诿称是阎锡山个人行动他们不太清楚。张澜劝责道：“补牢未晚，切不可再！今后务必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张群素来敬重这位乡里前辈，默然未再作声。

9月15日毛泽东往“特园”看望张澜作长时间密谈，他向张澜介绍了国共和谈情况，告诉张澜已部分达成协议，目前症结仍为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蒋介石正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运兵，名为接收实为准备内战。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张澜推心置腹地说：“在‘五四’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人民能够过问政事，我曾经同吴老（即吴玉章）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队于人民的重要性，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给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毛泽东连连点头赞许。接着张澜建议说：“现在你们是同国

民党关起门来谈判，应将已谈一致的公诸于众，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将来不承认。”毛泽东欣然采纳，当即考虑对策，张澜主动表示：“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让全国人民监督和推动。”毛主席又欣然采纳，当面赞誉张澜是“老诚谋国”。毛主席与张澜还商讨了西南大后方问题，民盟与中共的配合问题，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问题，还特别商谈了“内战如不可避免四川怎么办问题？”毛主席希望张澜以其威望影响地方实力派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希望他协助地下党发展地下武装，张澜完全同意。张澜的公开信随即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华西晚报》发表。

10月3日，正值张澜主持召开民盟临时全国大会之际，惊悉蒋介石为了镇压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加强对云南的控制，密令杜聿明指挥云南中央军包围昆明，围攻省政府所在地，免去龙云在云南的一切职务。龙云是由民盟主席张澜介绍秘密加入民盟的盟员，对民盟在昆明的民主活动多有贡献。此刻蒋介石竟向民盟开刀，更使张澜深感形势恶化，对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更为担心，忧心如焚。张澜以蒋介石无信无义，流氓成性，立即派人告诉周恩来敦促毛泽东早日离渝返延安。

张澜担心毛泽东的安危，不是没有根据的。现任纽约《北美日报》编辑、张治中的哲嗣张素初在《重庆谈判四十年》一文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最近笔者听纽约一家华文报纸的董事长说，他当时是阎锡山的机要秘书，当时的确看到一封要谋杀毛泽东的电报，后来因为有张治中将军陪同不能下手，毛方幸免于难。”张澜的深谋远虑和他与毛泽东诚挚友谊再次生动地体现了出来。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十分关怀民盟的建设，10月10日午后2时，他在桂园会见中国青年党曾琦就民主同盟和青年党问题进行了商谈，毛泽东希望曾琦与民盟的立场保持一致，为民主活动多做贡献。

10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团在桂园签署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毛泽东即于次日飞返延安。张澜又往机场话别，高兴地说：“日后中国实现了民主，我到延安去看望你们！”毛泽东热情地说：“欢迎！欢迎！我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你。”后来张澜收到毛泽东安抵延安消息说这下我才放了心。

1929年3月12日孙中山奉安大典纪实

魏文海

1929年3月12日我参加了孙中山奉安大典，作为历史见证人，我有义务把参加此次大典的情况，作如下纪实。

1928年冬，我于高中毕业后，经山东省教育厅初试又保送到南京复试被录取为军政部军需学校第五期学生班的学生。1928年冬入学。就是在我们入伍教育期间的1929年3月12日那一天，我们学校的全体学员生被指定为孙中山奉安大典的仪仗队之一，参加了那一次典礼。

先是3月11日下午2时，军政部军需学校的训育主任（当时该校没有设置政治部）墨林翰召集全校队职干部和学员生讲话。他宣布：“明天——3月12日是孙中山于1925年在北京逝世的纪念白——我们学校的学员队95人和学生队52人，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院校参加奉安大典仪仗队的资格，去参加孙总理的奉安典礼。明天上午8时，我们学校准时到达南京三牌楼，加入仪仗队序列。在南京被指定充任仪仗队的还有中央政治学校（该校在抗战末期在重庆改称中央政治大学）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当时该校学生有第六期留学预备班的学生和第七期学生总队）”

他说：“孙总理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父，他的奉安典礼就是国葬大典，奉安大典与一般庆贺典礼有本质不同的区别。学校要求你们一方面表现出军事院校学员生的气质——活泼英武、纪律严明；另一方面表现出对孙总理的敬仰与缅怀，庄严肃穆的气氛。

接下去，他讲述了孙总理光荣伟大的一生，他说：“孙总理的遗教，博大精深，大家将来都要认真研读，深刻领会。古人常把“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的成就，作为人生追求实现的目标，

并以此作为评价人物历史地位的依据。孙总理的道德功业，可以说达到了这三个方面的最高成就，永垂千古！我们身为革命军人，必须以继承孙总理遗志，完成总理遗嘱的使命，献身党国，奋斗一生！”

3月11日晚上9点钟下自习后，学生队队长陶春霖又召集讲话。他对参加奉安大典有关着装，行军等问题作了些规定。他说：“你们都是些效法班超投笔从戎、矢志报国的青年学生，一定会理解明天参加孙总理奉安典礼是一次有纪念意义的举动。你们会自觉地遵守纪律、表现出英武活泼和庄严肃穆的哀悼气氛。”

3月12日晨7时30分，我们集合从中山东路牐政牌楼的校舍出发，沿着中山路这条主干道经新街口向西北鼓楼方向进发，8时左右到达中山北路三牌楼指定的地点，停止待命。又过了十多分钟，所有充任仪仗队的单位，都按计划进入了序列。大致是8点15分左右，据说是担任奉安典礼总指挥的朱培德从挹江门方向骑马来检阅仪仗队序列，他后面跟了一个留八字胡的将军名叫谷正健的是国民党军的宪兵司令。他们两人后面还跟了五六个校级军官。我这个由山东来的北方学生，没有见过国民党的这些军政要人，是我们学生队中贵州籍的同学李正刚低声告诉我才知道的，李正刚介绍说：“朱培德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现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谷正健是宪兵司令，还是我们贵州人。”

典礼总指挥部的人从挹江门方向到鼓楼之间，来回巡视了两趟，那时，我在三牌楼向左右望去，马路两旁站满了穿灰色棉军服的仪仗队。除了中央政校、中央军校和我们学校外，还有哪个军事学校或者建制部队参加，我搞不清楚。无疑，这个仪仗队的阵容，是声势浩大的。

在一般年份，南京在春分前后的气候，虽说仍会春寒料峭，但大体上抵不过春意盎然的温暖趋势。可是1929年3月12日这一天，尽管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可是气温特别偏低。当时，我穿

的灰棉军服，内衬一件毛衣，还禁不起刺骨寒风的劲吹，俨如三九严冬，我们进入仪仗队序列后站在三牌楼一个多小时里，冻得人人跺脚，几乎浑身发抖。我们急切盼望走动走动。

孙总理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后，他的灵柩暂厝在北京西山碧云寺，1929年3月上旬由北京沿津浦铁路南运到南京下关车站的。3月12日9时左右，灵柩到达南京挹江门，这时，仪仗队出发前进的行军号吹响了，我们以“齐步走”的步伐，向鼓楼方向缓缓进发，大约10时半左右，我们到达南京城正东的中山门。

1929年春那一段时间的南京，依然是一片破败的景象。所谓“六朝金粉”只不过是历史想象出来的胜景罢了。1928年开辟的中山路，仅修筑成主干道的部分，马路两旁拆除房屋的瓦砾堆积累然，人行道坑洼不平，人人都有行路难之感。据说，正是为了3月12日孙总理的奉安大典，中山路的主干道才在日夜抢修中搞得初具规模。

南京城周号称80里，在这空廓的古城里，中华门内、夫子庙一带是最繁华的区域。那时，从挹江门到鼓楼，路旁到处是空地，居民点稀疏得很，从鼓楼到新街口，马路两旁也只有少数房舍。由新街口向东——中山东路一段（东至中央医院励志社），人烟比较稠密。从中央医院再向东到中山门，路旁尽是菜地。所以，奉安大典这一个长序列，行经南京城内约8公里长的中山马路时，只有新街口东向到中央医院那一段中山路两旁的群众，比较拥挤。他们扶老携幼，有不少人还带有黑纱。他们都以对孙中山无限敬仰、诚挚缅怀的表情，注视着这一个笼罩在悲哀气氛中的长序列，有的还流下泪来。至于其他地段，马路两旁只有零零落落的少数群众围观而已。

出中山门向东北行进，大概在上午11时左右，序列到达中山陵。

我是第一次来到中山陵的。中山陵座落在紫金山山麓西端，气势磅礴，雄伟壮观。据当时南京的报载，中山陵从1926年开始兴建，其主要建筑物有牌坊、墓道、碑亭、祭堂和墓室等，另外还有些附属建筑物。那时，中山陵附近栽种的松柏树还未成林，还不能形成郁郁葱葱的气势。我们沿着墓道，拾级而上，越过牌坊，又朝祭堂方向登上无数台阶，最终到达祭堂东侧下第三块墓道旁平地，经整顿队形后，稍息等待。

所谓中山陵的“气势磅礴”，在于它北枕紫金山，西带长江，东南部的起伏地带，可极目千里，西南金陵古都虎踞龙盘。我到南京仅四个月，除在星期天休息时去过夫子庙、秦淮河这些繁华地区以外，尚无暇遍览金陵的名胜，今天登上中山陵，确有心旷神怡之感。正在我遐想之际，仪仗队的“立正”号音响了。我们在立正中遥见孙中山的灵柩。前后由无数执绋人拥簇着沿着墓道向上登临。灵柩行进到距我们约50米处时，我们的队长高喊了一声“敬礼”，我们全神贯注、严肃诚挚地举手敬礼。我看到在灵柩前执绋的人群中有几位女性，但我认不出谁是宋庆龄。在那些国民党男性执绋的要人中，我认得出蒋介石，于右任，还有鹿鍾麟。（鹿鍾麟是国民党建都南京后继冯玉祥之后的第二任军政部长，他曾于1929年2月上旬到军需学校讲过一次话，所以我认识他），对于宋氏三姐妹，因为在行举手礼中，并未看清楚。

灵柩抬进中山陵祭堂后是如何安葬的？在安葬中在祭堂内部举行过什么仪式？这一切，我们都不可能看到。

大约在12时左右，安葬典礼完毕后，仪仗队吹出了“休息”号声，我们才解除了“立正”姿势。这时太阳显示出有些温暖的威力，我们精神上松弛了一些。突然间，站在我身后的同学李正刚又拉我的衣服并悄悄地告诉我：“站在中山墓堂西侧的三位女性中，那位穿一身黑衣服并戴一顶黑色大沿帽的便是宋庆龄”。我定睛看去，但看不清楚。而三位女性中确有一位身着黑服素装，只

此而已。

又过了十几分钟，奉安大典“礼成”。等待那些执紼的要人走下陵墓后，我们这些仪仗队才分批整队离开中山陵，返回到学校。

那一天下午，等于休假半天，由于气候很冷，教室里火炉旁挤满了同学们，我们谈论着那一天的见闻，并且都认为一生中能参加孙总理的奉安大典是有纪念意义的。

[illegible]

1. 凡在本行開辦之各項業務，均應遵守本行所定之規章制度，並應隨時注意業務之改進，以期提高服務品質。

驰名遐迩的 中国标准铅笔厂

龙明桥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菜园坝地区曾有一家颇有名气的企业——中国标准铅笔厂。论规模，不算大，资本总额仅 1,200 万元（国币），职工总数仅 170 余人。但它生产的铅笔、蜡笔，品种多、质量好、价格低廉，是地道的国产商品，深受国人欢迎，特别是中小學生，更为喜爱，产品畅销大西南、大西北各个地区，对战时大后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爱国创业 上海建厂

中国标准铅笔厂，原本是上海的一家民营企业——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公司，创建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春。30 年代的上海，已是英、美、法、德、日等列强在我国争夺市场、掠取资源的角逐之地，金融被洋人操纵，市场被外货垄断。尤其是铅笔市场，完全被德国、美国、日本商人所操纵。他们的“三堡垒”、“美女牌”、“老鸡牌”等高中档铅笔，以质量领先占领了上海各大公司、文具商店的橱窗、柜台。日本出产的低档铅笔，更以惊人的低价，倾销市场。于此夹攻形势下，要建立发展我国铅笔工业，实非易事。该厂创办人吴羹梅先生，为我国制造铅笔专家，颇有名望的爱国实业家。他早年留学日本，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谢绝日商的厚利聘请，满怀实业救国的理想和希望回到上海，立志创建和发展我国的铅笔工业。他对于推广国货，抵制洋货，建立民族工业，具有极大热忱，乃约集志同道合者，创办了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公司（即中国标准铅笔厂）。

从筹建到建成、投产、实现完全国产铅笔的目标，以及战胜外国竞争对手，完全占领国内铅笔市场，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办厂之初，设备、材料、人员、技术困难重重。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国内没有工厂所需的机器和原材料，必须由国外进口。吴羹梅只好再去日本，购回全套生产铅笔的机器和工具；又向美国购进制棒木版；向日、德购进粘土；从锡兰买进石墨；还在日本采办了油漆，才开始了第一批铅笔投产。然而，靠国外进口原材料办厂生产，并非吴羹梅的初衷。他所向往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完全国产的铅笔。他在建厂后，便积极在国内寻找原材料。后经多方调查了解，在苏州找到粘土，自湖南买到石墨，从云南购得虫胶片，终于实现了制成完全国产铅笔的目标。以他的名字（原名吴鼎）命名的“鼎牌”铅笔，以完全国货的声誉，摆上了上海各文具商店的柜台，走进了课堂，走向了全国。

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公司，虽然造出、销售的已是地地道道的国货，但要击垮德国的“三堡垒”铅笔、美国的“美女牌”铅笔、日本的低价铅笔，困难不少。该公司（工厂）在吴羹梅领导下，一边组织生产，一边加强技术研究，发展铅笔品种规格。继最初生产的“200号好学生”、“300号小朋友”铅笔之后，又生产出“500号航空救国”等36个品种。同时，为了降低成本，减少开支费用，他主张办厂要注重实效，避免浪费，“让一分钱发挥两分钱的作用”，坚持勤俭办厂的原则，对出厂产品实行薄利多销的策略，去占领市场。这个厂还很重视爱国宣传，抵制洋货。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厂里用“中国人用中国铅笔”八个字制成大幅广告，在闹市大商店中陈列自己的产品，号召爱国者购用国货，激发同胞们的爱国热忱。

抗战爆发 内迁重庆

正当中国标准铅笔厂业务蒸蒸日上的时刻，抗日战争爆发了。

1937年8月，战火逼近上海，该厂即于是年9月奉令迁武汉，再迁宜昌。在汉宜两地，均曾开工生产，供应后方各界之需要。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迁到重庆，于菜园坝正街15号处购得厂房，在1939年6月全部复工。

中国标准铅笔厂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国币1,200万元，职工170余人。该厂产品有飞机牌、鼎牌两大类，约34个品种，另加蜡笔2种。平均每月铅笔产量4千余罗（每罗12打，每打12支），最高生产能力每月可达万余罗。该厂为战时大后方唯一铅笔制造厂，故产品行销区域甚广。大至川康鄂为一区，以重庆、成都为推销中心；贵州云南为一区，以贵阳昆明为中心；两广湘赣为一区，以桂林衡阳吉安为中心；陕甘豫为一区，以西安兰州为中心，形成一个包括西南、西北整个地区在内的大的销售网络，且畅通无阻。此外，该厂的产品还打开了福建、新疆的渠道。每年销售数量，总计为4万余罗。

抗战时期在重庆开工生产，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经受的困难危险不少。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野心正炽，大批日军机群，天天飞来重庆，施行狂轰滥炸，多少房屋被毁，多少老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工厂生产很难正常进行。中国标准铅笔厂亦曾两次遭敌机轰炸，总经理吴羹梅亦曾两次被敌人的炸弹震倒受伤，住院治疗半个多月。可是，困难和危险吓不倒中国人，爱国实业家吴羹梅虽屡遭危险，但没有减退斗志，反而更加坚强。他克尽职守、呕心沥血，积极加强经营管理，保证正常生产，保证铅笔的质量与信誉。为了防空，该厂曾在厂附近的山涯中挖山洞，装机生产。但又遇停电频繁，生产时断时续。之后，该厂在南温泉乡下购得一块地皮，建成分厂，并添置了柴油发电机，确保生产正常进行，不再受空袭和停电的影响。

管理有方 劳资同心

中国标准铅笔厂在重庆时期，经营管理颇具特色，较之其它企业，确有独到之处。首先，在解决资金短绌方面，该厂善于利用人际关系解决困难。例如该厂董事长潘公展，原本是国民党CC派要员，抗战前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他同国民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均有广泛联系，颇有交情。吴羹梅就请他多方联系，吸引资金。正由于潘的出动，当时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单位，均向中国标准铅笔厂投放资金，使这个规模不算大的中小型厂有足够充裕的资金开工生产。第二，整顿厂内职能机构，加强管理职能。该厂在总经理、协理之下，分设秘书室、研究室、工务科、总务科、营业科、会计科、材料科，划分职责范围，各负其责。第三，建立销售网络，打开销售渠道。该厂在重庆、贵阳、衡阳、西安分别设立发行所，作为联系大西南、大西北行销区域之中心枢纽。第四，注重产品质量和花色品种之研究。该厂特聘懂行专家主持研究室工作，以提高生产技术、改进制造铅笔所用各种原料之品质为主要任务。在渝期间，该厂研究室对于提炼笔铅、粘土、软化柏木等项工作，均有相当成就。第五，该厂为保持工作效率，成立了机修部。除经常性的机器设备维修外，专制铅笔机械零配件及工具。并能自己制造铅笔机器。第六，该厂生产工艺流程有序，一环扣一环。在工务科之下分设制板部、制心部、制桿部、成品部，各部有各部的质量要求，便于质量把关、监督。

此外，中国标准铅笔厂很关心职工福利事业。“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各式各样的福利机构，均有设置。据档案材料记载，计有下述六个方面：（一）重视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在上海时曾举办过职工夜校。工厂迁渝后，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合办了职工补习学校，特请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担任学校董事长，杨卫

玉先生为副董事长，美国留学归来的喻兆明博士担任校长。全部经费约 50 万元，完全由该厂负担。依照职工文化程度，设初级四班，高级三班，全部学生约 100 余人。（二）成立合作社，方便职工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三）成立康乐部，康乐部内设有图书室、阅报室、篮球场，使职工在业余时间有正当的娱乐。（四）成立诊疗室，聘有中西医师，并备有常用西药，职工患病，实行免费诊治。如需外购药品或住院治疗者，另有补助住院费、补助医药费的详细办法。（五）设立托儿所，收托职工幼儿。（六）代投职工人寿、财物双项保险。

正由于该厂重视职工福利，为职工解除了后顾之忧，业余时间又有正当文娱生活，加之在生产经营管理得法，使该厂劳资关系正常，无论资方、劳方一个心眼搞生产、搞经营，支持抗战、支援大后方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

1948 年发生在重庆的抢米风潮

蒋华村口述 刘志成整理

一、抢米风潮的发生

1948 年 6 月，正值国民党当局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其军事、政治均处于急转直下之势，国统区政治动荡、经济混乱、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在当时的重庆，影响市场物价水准的棉纱、黄金的黑市价格不断上涨，而川东、川南的粮食则因价格问题，相继地运往湖北和成都等地而导致了重庆粮源的紧张。与此同时，市面上盛传“国家大量货币将要出笼，重庆粮食储量已经不多”等消息而致人心惶惶。当时工资收入的起伏波动又是以大米的价格为计算标准的，因而市民们对米和米价十分关注，唯恐米价调高影响生活，故纷纷购储粮食以防万一。然而当时粮店每日供应大米的数量又很有限，故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随着军事形势的恶化和通货膨胀的加剧，群众急不可耐、卖米心切而导发了 6 月 16 日的特大“抢米风潮”。这一天，全市有 70 多家粮店被抢，被抢走的大米约 7000 余担。这次抢米事件对重庆市有关当局震慑很大，当局迅速派出大批军、警、宪赶往各现场镇压，除打伤无数的群众以外，还逮捕了 300 多人交由警备部和警察局分别审讯。当局以武力镇压了这次抢米风潮。

二、抢米风潮发生以后……

6 月 16 日当天，我们粮商业同业公会正在召开全体理、监事及各区负责人会议，会议及时通报了上述情况后就中止了会议，大家都感觉到了某种不祥之兆。当时我偕同重庆市社会局局长陈去

惑赶往渝舍面谒杨森市长报告情况，可杨森不等我们开口即首先抢着说：“这是共产党干的”。企图嫁祸于共产党。我立刻向他说明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后，杨森则厉声厉色地对我说：“照你说来，粮食公会要负责，你是理事长，是有责任的”。说完此话后，杨森急匆匆地愤然而去。这时我心里犹如 15 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感到很不是滋味。

我返回公会后，正在琢磨此事，忽接卢作孚先生派专人给我送来通知要我到他那儿去谈谈。后来我才得知卢先生刚从上海返回重庆，尚未休息，得知此事后即约我相见，为此我很感激他。卢先生曾经和我在粮管局共过事，我们不分彼此，相互信任，交情颇深。与此同时，重庆绥靖公署长官朱绍良也在卢先生刚刚抵达码头时约请卢先生，因为朱长官深知卢先生在执掌全国粮政时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因为朱长官向卢先生通报了“抢米风潮”之情况，卢先生深感事态的复杂和严重故立刻约见了。以明瞭究竟。刚一见面他就严肃地对我说：“华村，想不到你闯下大祸了”又说：“今天杨森市长在向朱长官汇报抢米事件时，一口认定是你身为公会理事长的蒋华村囤积粮食，操纵市场，扰动人心，制造混乱而造成的，他请绥靖公署下令逮捕你究办。我当即对朱长官说蒋华村搞粮食公会是很负责的，我知道他本人并无多大的经济力量，也不敢操纵市场，这事还须多方了解一下，明日再向长官报告。”然后我立即向卢先生详细地分析汇报了发生此次风潮的原因以及各产粮区的变化情况，诸如泸县、遂宁一带的粮食均运往成都，而涪陵、万县等地的粮食均运往湖北销售，因为成都和湖北等地的销售价格都比重庆为高。至于是否有人在操纵粮食市场制造混乱，我当即向卢先生表白绝无此事并告知他自 1941 年因国民党所谓的“操纵粮食案”中枪毙了成都市长杨全宇之后，似乎没有听说过谁敢操纵粮食市场。在和卢先生作了这番交谈后，卢先生的情绪变得平稳些了，而我本人先前的紧张心情也稍稍松弛

了一些。

这时卢先生问我能用什么办法来稳定人心？我立即向他陈述了我的想法，即由粮食公会向各销商发出紧急通知，不准停业，尽量供应。同时我又提出四点建议。即：（1）按照卢先生当年主持粮政时的作法，举行产粮地区六十县粮政负责人的会议，听取情况，求得支持。现在可否由绥靖公署先召集附近十余县县长、田粮处长、粮商公会理事长等来渝提前商讨对策；（2）可否动用田联总处核准的3000万元粮食贷款，由中央银行先拨出500万元作为粮食购储押汇；（3）如确因缺粮而供应不足时，可否向粮食部储运处借粮来平糶；（4）产销两地均实行议价挂牌交易。

卢作孚先生全面了解情况后即向朱长官作了汇报，似乎真情实况已经昭示天下了。然而余音未尽，6月17日市社会局陈去惑局长在市参议会上报告说：“本市粮食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川东、川南粮食调运湖北、成都所致，绝非人为操纵因素。要疏通粮源，唯一的办法是3000万元的粮食贷款立即拨到，500万元的押汇立即兑现”。但他却认为此次抢米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并报告了一些抢米的时间、数量及地点和被捕的人数等，这样就给此次抢米风潮润上了政治色彩，其用心何在自不必说。

三 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

6月17日会议以后，市里又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并先后作出了一些相应的决定。在这些决议中强调了实行议价交易，保持产销合理价格。6月17日夜，由绥署萧毅肃参谋长主持召开了粮食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原全国粮管局局长卢作孚、中央银行的杨小波，市参议会的周懋植、农民银行的徐经理和我等人。朱绍良长官也到会并讲了话。

6月18日，由朱长官署名电令杨森市长飭其照办的五条稳定粮食供应的办法。即：（1）平抑粮价，议定合理价格；（2）严厉